GANSU
SOCIAL
SCIENCES

学林华章

《甘肃社会科学》创刊30周年纪念文集

（1979—2009）

胡政平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学术刊物与学术生产 1
探访中国学术的前沿风景——我与《甘肃社会科学》“学术访谈”专栏 10
注重学术面向现实服务社会——祝贺《甘肃社会科学》三十华诞 ...16
学术精神的坚守创新与学术成果的凝练提升——纪念与怀念 21
追求形式与内容的和谐完美——一个读者兼作者的心声 89
特殊情缘堪追忆深情寄语盼名刊 92
我与《甘肃社会科学》 98
“寻找”阶层的力量——恭贺《甘肃社会科学》创刊 30 周年 102
《甘肃社会科学》是我的一面镜子 109
法经济学的当前发展与主要论题——兼贺《甘肃社会科学》创刊 30 周年 112
我所知道的《甘肃社会科学》 131
雨雪冰霜展英姿春华秋实谱新篇 135
生之灿烂与君相伴——《甘肃社会科学》对我的学术知遇之恩 139
勤耕的园丁育人的沃土——《甘肃社会科学》创刊 30 周年随想 149
我与《甘肃社会科学》二三事 153
专题组稿与特色选题——《甘肃社会科学》法学栏目的经验与体会 157
《甘肃社会科学》社会学栏目印象 163

学术刊物与学术生产

章辉

在中国学界，通常的学术生产流程是，个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和兴趣爱好自由选择学术课题，然后按照一般学术课题的制作程序进行知识生产，其程序大体是，收集整理资料，撰写相关论文发表，申请各类课题，获取各级资金的资助，最后整理课题，完善书稿，润色文字，交付出版机构出版。其中，学术刊物在学术生产机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学术刊物是反映学界前沿成果最重要、最及时的园地，学者在此平台上展示研究进程，进行学术交流，砥砺学界思想。

学术刊物几乎是每个中国学人都要打交道的学术载体，在回顾我与学术刊物的交往时，令我想起对我个人来说不算短暂的学术训练历程。本科我在历史系就读，但如一般的文学青年，对于文学极为爱好，阅读了大量的中西文学名著。但细看专门的文学评论家撰写的学术论文后，发现自己从阅读中所得甚少。反复思索，得出缘由，盖因自己缺乏理论素养，只能停留在个人印象式的欣赏水准而无法穿透纸背以获得更多的文化意义，于是找来西方文论方面的书籍，渐渐进入美学和哲学这一玄奥又令人兴味盎然的领域。记得把当时只出了 5 卷本的《朱光潜全集》找来一卷卷读下去，在读到朱先生写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与李泽厚论争的文章时，我觉得李泽厚先生的观点似乎更为深刻，于是找来李泽厚的书籍。在临近本科毕业时，面临择业和兴趣的矛盾，我有一丝忧虑，文学和美学是我的爱好，但始终只能是业余爱好岂不是人生憾事！如果能够把业余爱好变成日常工作，以此为业，不仅能深入文学的奥堂，还能以之为谋生的工具，岂不是生活的美事！于是抱着极大的热情报考了中文系的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虽然此后发现自由阅读的乐趣与专业学术的研究有一定差距，但以爱好为专业却给了我无尽的享受，特别是，自由地阅读和自由地思考人生最为重要的也很虚无的生存问题就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于一心要搞清楚为什么活着的现代人来说，能够有时间有心性探究这些务虚的问题，也是难得的生存样态。

自读研究生进入学术训练迄今已十年有余。回顾十年摸爬滚打的历史，取得的些许成绩，固然与自己的努力分不开，也赖于众多师长关怀和机遇造化，与各类学术刊物的交往也是其中的重要一部分。西方学界 publishorperish 一说，中国学界也如此，都有发表学术论文的压力，其利弊此处不赘。

对于初学而言，发表论文是走向新的旅程的开始，标志着学术训练已初具成效，“学者”这一梦寐以求的神圣角色似乎离自己不再遥远，仿佛自己从此可立言天下。而且，文字变成铅字也是一大乐事：自己的文字不再是抽屉里的日记般的私人财物，而是走向公共交往空间被他人审阅，其中的纠集，既有思想火花与他人分享的喜悦，也有自己隐私暴露般的惶恐。

初涉学界的年轻学人往往对学术、学人、学业抱有一份真诚的虔敬，这份虔敬是其探索真理的可贵心性。但在中国学术界，学术生态却具有另一番景象。在理想化学术而后经过现实的洗礼，学术、学人和学界往往以另一面目呈现给年轻学人。在理想幻灭之后，理性的反思会给学人以新的关于学术的观念。本人也曾理想化人文学术，对其社会功能和人生意义抱有莫大的期望，但经过一系列磨难之后，对于学术这项工作有更多的体悟。在我看来，学术首先是一份工作，它与农民种田、工人做工一样，做好工作乃学人分内之事。其次，学术是诉诸理性的工作，按照康德的分类，知性是纯粹理性的一部分，无关人的实践理性和审美趣味，学问并不等同于道德水准和人格志向，这样就可以理解中国学者各种令人拍案惊奇的人格缺陷和怪异做派了。最后，学术诉诸理性，而理性是有限的，特别是人文学术大都是个体性的工作，基于个体的知识和视野局限，加上这门学问固有的飘离现实的抽象性，一己之见往往是学术成果的最终定位。因此，学术需要磨砺，需要学人相互的砥砺。由此，谦虚谨慎乃是学术的职业道德。

学术刊物在我的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与编辑打交道也成为工作的一部分。记得第一次学术论文发表，是在硕士研究生三年级时。在撰写硕士论文时，把自己的关于李泽厚的美学及其相关问题的

与一作者相左的意见整理出来寄给杂志，编辑很快来函，要求润色文字发表，这对于初涉学术奥堂的学子而言，真是一个莫大的鼓舞。此后，阅读书籍，撰写论文，发表论文成为我的主要工作，特别是基于中国具体的教育和学术生产机制，得学位、评职称均需论文，发表论文更是成为一项必修的功课。虽然我并不对自己的文章抱有迷恋般的自信，但编辑的支持和热情还是令人非常感动。其中，《甘肃社会科学》对于我的学术研究的支持值得铭记。记得在这个刊物发表文章是5年前，把博士后研究报告中的一部分整理出来后邮寄给编辑，此后就与编辑胡先生熟识起来。随后应编辑邀约，组织了几次专题文章，做了近两年的美学文艺学专业的名家学术访谈栏目。期间，编辑的诚恳和对学术的尊重令人感怀。回想起来，在我打交道的众多刊物中，这个西北的刊物算是最为紧密的了。说来奇怪，这个给我很多学业支持的刊物，编辑胡先生迄今未谋面，只是有电话及书信往来，大概这才是真正的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吧，信息和学术的交流所维系的友谊并不需要一般的俗套。

在中国，学术期刊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专业期刊，二是综合期刊，三是大学学报。大学学报也可归为综合期刊之列。学术刊物之间竞争激烈，文章的影响力和转载率决定了其是否能够进入高一层次的期刊方阵，这对于编辑是巨大的压力。能否收罗高质量的稿件，能否疏通各类评委决定了刊物的生死存亡，由此，编辑不仅要有专业的眼光，还要有活络的社会人际关系，种种非学术的因素影响到学术刊物的发展，从而影响到学术生态。这其中的规则人人皆知，不足为外人道，也不必由我道来。学术期刊在中国水平尚低的学术生产力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目前学术界的流弊也已引起了同仁的关注。我认为，当代中国的学术刊物应具备如下理念：

其一，勇于发表新人的文章。学术的推进基于时代的演变，学术具有时代性，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后浪推前浪乃学术进化的基本之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今天的名家也曾经是新人，新人意味着新论题、新思想。特别是，对于新人来说，发表文章是对其专业训练的一种鼓励和支持，这种学术上的鼓励对于其职业生涯的意义有时是不可估量的，许多名人在回顾自己的学术职业的选择时，都谈到学术刊物的支持对自己专业方向定位的影响，乃至决定其一生的职业选择。时下刊物爱好名人效应，尽力刊登名人的文章。这些年我也经常荣幸与名人一起刊登文章，有时编辑托我约名人稿。在与名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对于所谓的名人也多少有所了解。在整个社会功利化的现时代，名人尤其忙碌，约稿很多，时常急就章，有些名人更是琐务缠身，不可能天天创新。其结果是，名人的文章要么重复自己，要么简直就是草稿，难以阅读。人文学术的名人通常也在五十以上的年岁，其学术声誉日隆之时也是其守成之日，也正是其心理板结层形成之时，理念的保守和知识的陈旧是其顽疾。

因此，不可迷信名人。

其二，文章不拘一格，可长可短。这一直是很多学术刊物的自语，但难以实现。文章最重要的是新见，篇幅在其次。今天的学术论文大多八股气浓厚，起承转合受制于一定的范式，形式规范成为其主要弊病。在刊物，主要是由于篇幅限制，其次，也是更为奇怪的，许多学术生产机构比如笔者所在的单位就规定，学术论文要达到一定篇幅方可计算工作量。学术论文是有感而发，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以篇幅论质量，实则咄咄怪事。

其三，发表建设性的学术书评。学术批评是生产创造性学术思想的前提。当代中国学术的流弊之一，是缺乏真正的学术批评。学术产品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是学人从自己的一己视角看问题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人文学术是闭门造车的结果。为了避免生造和臆想，学术交流是为必要。学术批评之于学术的意义，尽人皆知，但基于各种原因，中国学界的客观性书评难以存在。其原因，一是基于为尊者讳的文化传统，后辈学人难以在学理上批评前人和长者。二是因为师承关系，学生难以批评老师。中国缺乏真理胜过老师的追求纯粹知识的传

统，特别是基于各种利益关系，掌握资源的导师更是不能得罪，这就导致后辈无法真正超越前人，青年学人不敢或不愿对时贤提出不同意见。对于师长来说，由于缺乏理性的宽广的学术胸襟，对理性的限度缺乏认识，往往视自己的学术为生命，沉浸在自编自造的逻辑体系的圆满之中，不容外人做丝毫的批评，认为批评乃是对其学术生命乃至人格的毁灭，其结果是，正常的学术批评无法展开。事实上，中国学界的学术批评时常导致学人的党同伐异，同仁形同仇人，而又在同一领域谋事，不可避免地要打交道，于是冤冤相报，互相拆台，叫人难堪之处不可胜数。正是如此，中国学界盛行的大多是吹捧式的书评，说些不痛不痒的话，无助于学术推进，最终伤害的是学术本身。这里，我呼吁，有志于中国学术建设的学术刊物和学术编辑，以宏阔理性的胸怀刊发具有学理性的客观的书评，让学术回归学术理性本身，逐渐形成正常的健康的学术生态，以此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

其四，不趋新、不唯新。学术刊物关注的大多为学术前沿问题，而学术的主旨是创新，由此，学术论文的最重要之点是新。由于多种原因，这个“新”被理解成论题的新颖或者甚至就是题目的新颖。基于这种偏离，有些学术刊物倾向于追捧时髦的、前沿的理论问题，而对传统的文献性的或基础性研究的论文不感兴趣。在这种理解中，“新”就是学界的热点问题，但热点问题是不断推进不断更新的，今天是热点明天就不是热点了，这样的走马灯式的趋新去旧无助于学术演进，那些由长期学术积淀而来的基础性的学术研究往往无法得到关注。对于刊物来说，这种趋新的结果，不是对于学术的推动，而只是提供了学术研究的年度热点问题的文献。对此弊病笔者有过亲身经历。笔者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古典时期的西方美学的一个专题，投稿经常杳无音信，一编辑透露秘笈说，他们不刊发 20 世纪以前的主题的论文。学术的“新”创最根本的是内容的新颖，论证是否出新才是问题的根本。康德和老庄还可以一直说下去，关键是是否赋予其新的生命。

在学术生态还未健康时，在整个社会已功利化的今天，创办维系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实属不易。刊物之间的竞争，各种层次的评比，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抵牾等都让编辑寝食难安，学术刊物要有影响有个性方可流传，而有影响有个性的学术刊物的产生首先有赖于编辑的慧眼和奉献学术的热诚，更需要学界为学术而学术、为社会变革而学术的虔诚。

《甘肃社会科学》是一份颇为年轻的杂志，还处在事业的探索发展之途，她同时也见证了我的学术工作，愿我们在学术这块相对清净的绿地上一同生长！

作者简介：章辉，生于1974年，男，四川外语学院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教授、文学博士。

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语境中寻求理论和学术特色——写在《甘肃社会科学》创刊30周年

王三北

《甘肃社会科学》1979年初创刊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学界与外部同行接触与交流的日益频繁，随着中国改革进程与社会转型过程的深化，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和升级，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积累弥深的理论资源与现实动力，其稳步发展和提升是有目共睹的。从引文率、《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文摘期刊的转载量、期刊评价指标，尤其是读者对期刊的评价等考量，我觉得《甘肃社会科学》的影响度、知名度和特色度等显性指标和隐性指标均明显上升。这表明《甘肃社会科学》创刊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坚持探索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语境中寻求理论和学术特色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并且是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期刊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所谓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语境中寻求理论和学术特色，其内涵有二：首先，《甘肃社会科学》的“叙事根基”始终规范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语境的“场域”之中；其次，在此基础上，将甘肃和西部带进全国甚至是世界学术关注的视野，以此确定自己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话语体系中自己的话语权，即理论和学术的特色。

一、对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语境的坚守

（一）宗旨明确、导向鲜明当代的中国社会科学正处于发展建设、创新的阶段，虽然还未形成完整的成熟的学术研究机制体制，正在探索自己的成熟学术研究话语体系，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学术质量第一的方针，注重学术理论的原创性和学术前瞻性，注重应用研究，注重学术信息含量办刊宗旨是这一语境要求的底线。一个始终如一的正确的理论和学术方向，这是《甘肃社会科学》的主心骨和灵魂。把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服务这个导向融入期刊的原创性、学术性、学科性、学理性之中，用生动活泼、具有中国特色、读者乐于、易于接受的语言风格来表达。追求学术创新和学术规范，积极探索社科领域的“新成果、新趋势、新方法、新问题”，回答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的重大难点热点问题，履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能是《甘肃社会科学》的责任和担当。

（二）注重元理论研究，彰显学术价值《甘肃社会科学》是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综类学术期刊，栏目涉及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既有基础理论研究内容，又有应用对策研究内容，各栏目的发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优势，如哲学、文学、历史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占有一定优势，目前，文学、社会学、学术访谈、法学等栏目占有一定优势。不管怎么说，期刊在坚守元理论的基础研究价值做得较好，用开阔的学术视野为解决时代问题提供创新性思维。

基础研究是一切学科和理论的根基。历史经验表明，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会引起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甘肃社会科学》从基础研究对推动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坚守社会科学基础研究，30年来，办刊人员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在更多科研课题与职称诉求中，坚持以刚性的期刊容量将基础研究内容和版面最大化，激励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和时代的制高点上思考问题的基础研究，支持认识论的科学

研究方式，即使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也优先支持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框架、范式和模式类研究。把期刊办成具有一定新思维、新理念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的交流场，以实现学术的价值和功能。

（三）发挥学术策源地和培育基地的作用当下，大部分中国学术期刊如火如荼地忙于名刊工程、国内三大或者六大检索系统收录以及其他“核心”、“方阵”之类，以学术名家、名人、政府要员为基本稿源，博导、博士文章为起点，设立身份门槛。这也是颇为社会诟病的做法。其实，从学术刊物的长远发展来看，社会科学学术团队和学术储备人才是学术发展的“软”实力。青年学者、研究生梯队只是一个临时身份，他们是学术职业队伍的后备军和真正源头活水，他们学生特有的活跃思维和主动精神是学术界习以为常的观念、行为所缺失。《甘肃社会科学》高度重视这个群体的可能贡献，用高度社会责任感关注他们对新观念的接受能力、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开设青年论坛专栏为学术资源整合和体制革新提供崭新的人才储备和实验空间，鼓励那些人微言轻的研究者，坚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充分发挥了学术策源地和培育基地的作用。

二、开创理论和学术特色

（一）将甘肃和西部带进全国甚至是世界学术关注的视野大多的研究强调西部、西北和甘肃的外部因素对该区域学术勃兴的促进作用，《甘肃社会科学》则侧重对于学术发展内在动力的探讨：学术资源的利用，治学方法的传承，与主流学术的关系等。《甘肃社会科学》推出的“敦煌学研究”、“西路军研究”以及定期或不定期设“西部经济”、“区域文化”、“王符研究”、“丝绸之路”、“汉简研究”等栏目，这些栏目不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而且也具有全国意义甚至世界意义。《甘肃社会科学》将甘肃和西部带进全国甚至是世界学术关注的视野，以此确定自己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话语体系中自己的话语权，即理论和学术的特色。

西部、西北和甘肃问题，领域宽广，内容繁多。特别是有关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语言、

文学、音乐、舞蹈等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国际意义。如研究西北史地，必然涉及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的形成，正是古代东西方人民友好往来的见证；政治军事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联系到西北各族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历史。再如西北民族的融合迁徙，宗教的传播，语言文字的递嬗，经济文化的交流等，无不与国际的研究发生关联，产生影响。《甘肃社会科学》把分散于西部、西北和甘肃的各类哲学思想、政治、法律、文化、社会和生态的信息集中起来，加以提炼，以出水平、出品牌、出特色为出发点，通过刊登具有地方特色，又有全国意义的文章带领西部、西北和甘肃西部走进了全国学术视野关注的中心地带，不仅开拓了学术研究的领域和视野，更为新时期国家确定西部开发战略提供了思考原点和决策依据。

（二）区域特色的实证研究国家的区域发展政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指导意义，科学有效的政府行为，可以成为经济启动的催化剂，但区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需要按其自身发展规律运行，需要根据其地理、人文环境而因地制宜地渐进式发展。面对今日复杂多变的世界，西部、西北和甘肃地区的国防战略地位非但没有失去往日的重要性，而且还在与时俱增。因此，慎选适合西部自然环境特点的开发模式和手段，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可谓当务之急。这里地理环境千差万别，民族众多，在这样的空间背景下，如果没有坚实的精深、宽广的实证研究基础，没有多学科协作，没有不同研究手段共同参与合作性的区域实证研究工作，没有定量、定性的区域实证研究积累，就很难找到现实问题解决的途径。《甘肃社会科学》在西部经济、区域文化、敦煌学、边疆史地、少数民族等实证研究领域，尽可能针对具有典型意义、普遍的、带倾向性的问题，把在区情调研中摸到的具体情况上升到全局性、规律性来研究，引导学者养成一种专业自觉：把区域问题同国家全面统筹发展、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民族团结、巩固国防等重大策略联系在一起的，应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衡量和评价，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抓住规律上升到本质来认识。既要搞“点”和“解剖麻雀”，而又不是停留在“举例子”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层面上，使研究的针对性、前瞻性和战略性更强，让研究更具备学术一般的意义。

愿《甘肃社会科学》坚持致力于这种个性化的学术的继续努力，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积累、学术传统的建构及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王三北，生于1950年，男，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探访中国学术的前沿风景——我与《甘肃社会科学》“学术访谈”专栏

邵宁宁

《甘肃社会科学》创刊30年了。想起我与它的关系，便不由地想到我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的经历，想到那一组学术访谈，想到支克坚、董汉河、胡政平等先生对我的厚爱、支持和鞭策，以及他们身上那种不断探索的学术品格与朴实勤谨的敬业精神给我的影响。

回想我与《甘肃社会科学》的交往，最早的联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的我才从大学毕业不久，但居然就大着胆子写了一篇论述《水浒传》的文章，题为《地主阶级政治参与的悲剧》，大意是说，《水浒传》主题的农民说和市民说都存在着一些与作品实际不相符合的情况。按我的看法，这个故事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地主阶级政治参与的悲剧，小说的中心人物宋江，其实是一个试图将一群因种种矛盾铤而走险的社会下层人士导向匡扶时政、为国尽忠（所谓替天行道）道路的悲剧英雄。之所以获得这样的看法，除了对作品本身的理解，也与该时期正趋高潮的中国社会改革思潮密切相关。文章写成后，交给当时还在甘肃社科院任职的叶林生先生看，出乎意料地得到了他的赞赏，更出乎意料的是，他将文章推荐给了当时《甘肃社会科学》杂志的编辑翟建波先生。这当然使当时连初出茅庐都算不上的我大受鼓舞，虽然文章最终没能发表，但翟建波先生对它提出的意见却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他没有简单地评判文章观点的对错，而只是问我依据的是什么版本，因为不同版本的《水浒传》其主旨可能是不

同的；与此同时，还向我推荐一套《水浒》研究会编辑的丛书，建议我先做一番了解，再下结论。现在回想起来，他所说的这一切，本该是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开始时首先应做的工作之一，但当时的我还不大懂得，再加上知识兴趣转移，对文章的发表不发表并不怎么在意，所以也没有按他的意见去做认真的修改和补充，就是其后很长一段时期，也没有花工夫去补足那些必要的知识。许多年过去，虽然在已了解了必要的版本知识之后，我仍然没有放弃当年的一些基本观点，但作为我学术生涯起点的一部分，当年从翟建波先生身上感受到的一切，编辑为人的认真、谦和，刊物对文章质量和学术规范的高要求，却与《甘肃社会科学》这份杂志一道越来越清晰地镶嵌在我的记忆深处。

或许可以说，这是我学术生涯中一次重要的错失。由于这次错失，我和《甘肃社会科学》的密切交往，也被推迟了十余年。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

2003 年夏天，我颇有些偶然地参加了半天一个以“英雄”话语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由于是临时参会，并没有专门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凭记忆将《废都》出版当年（1993）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重新整理一遍，增添了一点新认识，仓促成文交给会议主办者。然而，到秋天却意外地获知，文章已被《甘肃社会科学》选中，即将与另三篇会议文章一起刊出。这真让我意外地惊喜，也意外地感激！有趣的是，回想我与《甘肃社会科学》杂志最初的两种交往，前一次是经人推荐的文章被婉言退回，后一次却是并未投寄的文章意外地被刊物选中。这或许都有些偶然，但正是这偶然中的必然，让我从不同的方面感受了这家杂志的编辑对于学术事业的那一份认真与虔诚。

而我也就这样和董先生结识了、熟悉了。其结果，就是催生了我在《甘肃社会科学》杂志发表的那一组学术访谈。也就是在那一年的冬天，他打电话给我，要我借在北京读博的机会，为刊物采写几篇学术访谈，借以展示中国学术的前沿进展。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趁着他来京办事的机会，我们在他下榻的饭店第一次就此事聊了起来。虽然此前已见过面，虽然很早就已读过他关于西路军的报告文学，但真

正聊起来，我不禁还是为他的健谈、为他对学术事业和刊物发展的那一份热诚所感染。

北京的冬天，有几分萧瑟，但我们的谈话，却洋溢着一股令人兴奋的热烈。作为一个有成就的报告文学作家，董先生深知访谈的意义和甘苦，对如何与访谈对象做深入的交流也有许多经验。对于如何做好这组访谈，应该说我们从一开始就有许多一致的看法。譬如，我们都认为，访谈一开始应先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做起，从自己熟悉的学者做起，这既是为了便于操作，也是为了确保质量。当然，对象必须是一流的，话题也应该是经过认真准备的，力求使访谈过程成为采访与受访双方一次较为深入的精神交流和互动的过程；访谈内容要力求切近学术研究的前沿或展示学术研究的新图景，并较准确地呈现一个学者的学术胸襟和学术贡献。至于文体，则不必过分追求现场感，以防止思路的断续与话题的零散。除了这些抽象的原则，我们也谈了许多具体的设想，包括访谈的话题、访谈的对象、访谈的方法等，其间穿插了许多关于共同熟悉的一些领域和一些人的种种印象和看法。这一夕谈话，使我受益匪浅。几年下来，我们的“访谈”，基本就按这个思路做了过来。

第一篇《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请的是我的导师杨义先生。当时他正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主张，我也刚刚为他的同名《讲演录》写过一篇文章。

观点是熟悉的，思路是熟悉的，人是熟悉的，做这样的访谈，自然驾轻就熟。

该文在 2004 年第 5 期《甘肃社会科学》上发表后，旋即为《新华文摘》转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许多读过文章的人都说，在杨义先生所有谈这个话题的文章中，这应该是最集中、最精要也最深入的一篇。“重绘中国文学地图”

的口号从那时起在有关学界广为传播，自然主要与杨义先生的学术影响力有关，但在这一过程中，这篇访谈所起的作用大约也是不可忽视的。

“访谈”的第二篇《学术—人生》，采访的是赵园先生。她也是我的老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为人、治学均以严谨著称。她从不轻易接受别人的采访，虽然答应了我的请求，却同时声明只愿以书面的形式回答我的问题。早在我进入社科院文学所学习之初，我就曾不止一次听到她批评现在的研究生不会提问，但这一次看到我的问题，她却在电话里表扬了我，说我会提问，并且一些问题的提法本身就已暗含了回答的可能。这当然也是愉快的工作。由于比较熟悉，与她的谈话，自然而然地就从学术过渡到了人生。而我为这次访谈拟定的题目“学术人生”，也包含了我本人对她的一种理解，但阴差阳错，发表时意外地变成了“学术—人生”。不过，虽然不符我的原意，却仍然提示了谈话的内容。这篇访谈发表后同样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许多关心赵园先生学术进展的人都将它视作一篇重要的文献，听赵老师说，著名日本学者尾崎文昭也曾一再向她夸赞她的学生“会提问题”。

第三篇《巴金研究：现状与问题——李存光先生访谈录》，采访的仍是我的老师。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之外，李存光的名气不像杨义、赵园那么大，但他却是一位真正的“专家”，一生主要的学术心力，都花在巴金研究上，先后著辑有许多巴金研究的著作，而我们平时的谈话，也是话题始终不离巴金左右，请他谈巴金研究，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完成上述三篇之后，我又接连做了杨匡汉、吴福辉、支克坚、赵逵夫、陈思和、钱理群先生的访谈，这些人也几乎都是我的老师。支先生、赵先生是我读大学时的老师，陈思和先生是我在复旦做博士后的导师，吴福辉先生是我博士论文答辩时的主席，钱先生、杨先生也都在不同的场合为我授过课。访谈不仅比较集中地呈现了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些前沿成果，而且也加深了我对他们的了解，促进了我对中国文学研究学术进展的进一步思考。

前面说到，我写学术访谈，一开始就打算与一般的新闻访谈拉开距离。

做杨义先生的访谈时，我先拟定了一个采访提纲，在电话里读给他听了。正式访谈那一日，不但我去了，有一些同专业或相近专业的同学也去了，我们挤坐在文学所杨老师的办公室里，样子很有点像是上课。后来同吴福辉先生和陈思和先生谈话时，也有同学或学生跟了去听。还在陆续发表期间，就不断有人我向建议，应将它们结集出版，为此，我也曾为它拟定过一个书名——《京海问学录》。将学术采访和自己的学习经历及其反思结合在一起，是我做这组访谈的初衷之一，也形成了它的一个突出特点。的确，将它们题作“问学录”或许比“访谈录”还更能突出这一点。

还需说明的是，这些“访谈”里的好几篇，其实都是书面完成的。赵园先生是这样，李存光、杨匡汉亦然。这里有性格、习惯方面的原因，也有机缘的因素。赵园先生说她缺少随机应答的“急智”，当然是自谦的表述，但不愿不经思考地发议论，也符合她为人为学的性格。李存光先生接受我的请求不久，就去了韩国；杨匡汉先生虽然常可碰到，但他也是宁愿用书面形式回答我的提问。这中间比较特殊的是支克坚先生，在他去世前这几年，我们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就是对访谈涉及的问题，实际上也已有过多次的交流，但最后“访谈”，却也是书面完成的。八篇“访谈”，倒有一半是书面完成的。这样的做法，当然可以说是有得有失。所得当然在系统和严密，所失则在失却了许多只有在实际对话中才能感受到的氛围、背景和机趣。说起来也是很有趣的事，虽然每次访谈前，我都先发采访提纲给受访人，但只要是对面交谈，几乎每个人的谈话都很难完全局限在那些预设的范围内。但也正是那一种旁逸斜出的姿态，随意挥洒的自如，以及诙谐幽默的机趣，让“访谈”成为一种有异于一般的学术论文的东西，产生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不过，这样的谈话对事后记录整理的要求也比较高。给我印象很深的首先是与吴福辉先生谈话那一次，我至今都不清楚帮我整理录音的李小红同学，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些录音上，到现在还后悔的是，发表时没能注明她对此作出的贡献。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赵逵夫先生的采访连续进行了三个晚上，全部录音整理出来至少有五六万字，幸而有马世年先生及其他几位同学帮忙，否则只是录出这些内容，也会让我感觉力有不逮。最后，还要说的是，从道理上讲，既是访谈就该“实录”，然而事实的情况是，出诸种种考虑，仍然有一些内容在发表的文本中没有刊出。有一些话，谈起来很有意思，但发表出来却有种种妨碍；还有一些话，同样有意思，但与访谈的主题关系不大。这都得忍痛割爱。此外，访谈的发表毕竟也有篇幅的限制，这或许也应算是不能完全做到“实录”的一个客观原因。

从 2004 年到 2008 年，在《甘肃社会科学》杂志上，我陆续发表了七篇访谈（另有一篇钱理群先生的尚在整理中，不久即可面世），同时刊物也约请其他一些年轻学者做了同样的工作。“学术访谈”渐渐成为《甘肃社会科学》一个有特色有影响的栏目。对此，刊物的两任主编董汉河先生、胡政平先生均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们对我的工作始终给予极高的评价。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鞭策，就不会有这些访谈。在此，让我再一次对所有支持、协助我完成这些访谈的老师、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愿《甘肃社会科学》越办越好，“学术访谈”新意常存！

作者简介：邵宁宁，生于 1965 年，男，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